

高春艳 袁志伟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李因笃评传

学术研究系列

关学文库

总主编 刘学智 方光华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关学文库 总主编 刘学智 方光华

学术研究系列

李因笃评传

高春艳 袁志伟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因笃评传/高春艳, 袁志伟著.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4. 12

(关学文库/刘学智, 方光华主编)

ISBN 978-7-5604-3536-7

I. ①李… II. ①高… ②袁… III. ①李因笃(1631~1692)—评传 IV. ①B24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13469 号

出品人 徐 晔 马 来

篆刻 路毓贤

出版统筹 张 萍 何惠昂

李因笃评传 高春艳 袁志伟 著

责任编辑 王学群 装帧设计 泽 海

版式统筹 刘 争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 号 邮 编 710069

网 址 <http://nwupress.nwu.edu.cn> E-mail xdpress@nwu.edu.cn

电 话 029-88303593 883025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陕西向阳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67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3536-7

定 价 35.00 元

《关学文库》组织工作委员会

主 任 赵正永

副 主 任 江泽林 王莉霞 张岂之 陈国强 张祖培

执行副主任 徐 晔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上官吉庆 马 来 王 勇 王莉霞

王景安 方光华 权 俭 刘学智 江泽林

李 浩 李明远 张小宁 张岂之 张社年

张祖培 陆柯仑 陈国强 岳 亮 赵正永

赵馥洁 姜 锋 桂维民 徐 晔 郭大为

郭立宏 阎晓宏 彭树智 董 军 薛保勤

《关学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张岂之

副 主 任 赵馥洁 薛保勤

执行副主任 徐 晔 马 来

总 主 编 刘学智 方光华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来	王美凤	方光华	米文科	许 宁
孙学功	刘学智	杨建辉	李似珍	李颖科
何惠昂	张 波	张 萍	张 雄	张世民
张岂之	陈战峰	林乐昌	赵瑞民	赵馥洁
郝润华	袁志伟	徐 晔	高彦平	郭文镐
曹树明	韩 星	路毓贤	薛保勤	魏 冬

总序

张载(1020—1077),字子厚,宋凤翔府郿县(今陕西眉县)人,祖籍大梁,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进士。张载出身于官宦之家。祖父张复在宋真宗时官至给事中、集贤院学士,死后赠司空。父亲张迪在宋仁宗时官至殿中丞、知涪州事,赠尚书都官郎中。张迪死后,张载与全家遂侨居于凤翔府郿县横渠镇之南。因他曾在此聚徒讲学,世称“横渠先生”。他的学术思想在学术史上被称为“横渠之学”,他所代表的学派被后人称为“关学”。张载与程颢、程颐同为北宋理学的创始人。可以说,关学是由张载创立并于宋元明清时期,一直在关中地区传衍的地域性理学学派,亦称关中学。

关学基本文献整理与相关研究不仅是中国思想学术史的重要课题,也是体现中国思想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举措。《关学文库》以继承、弘扬和创新中华文化为宗旨,以文献整理的系统性、学术研究的开拓性为特点,是我国第一部对上起于北宋、下迄于清末民初,绵延八百余年的关中学的基本文献资料进行整理与研究的大型丛书。这项重点文化工程的完成,对于完整呈现关学的历史面貌、发展脉络和鲜明特色,彰显关学精神,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在《关学文库》即将出版发行之际,我仅就关学、关学与程朱理学的关系、关学的思想特质、《关学文库》的整体构成等谈几点意见,以供读者参考。

一、作为理学重要构成部分的关学

众所周知,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发展的新形态与新阶段,一般被称为新儒学。但在新儒学中,构成较为复杂。比较典型的则是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南宋学者吕本中较早提到“关学”这一概念。南宋朱熹、吕祖谦编选的《近思录》较早地梳理了北宋理学发展的统绪,关学是作为理学的重要一支来

作介绍的。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将张载的“关学”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程颢、程颐)的“洛学”并列加以考察。明初宋濂、王祿等人纂修《元史》,将宋代理学概括为“濂洛关闽”四大派别,其中虽有地域文化的特色,但它们的思想内涵及其影响并不限于某个地域,而成为中华思想文化史上重要的一页,即宋代理学。

根据洛学代表人物程颢、程颐以及闽学代表人物朱熹对记载关学思想的理解、评价和吸收,张载创始的关学本质上当是理学,而且是影响全国的思想文化学派。过去,我们在编写《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宋明理学史》上册的时候,在关学学术旨归和历史作用上曾作过探讨,但是也不能不顾及古代学术史考镜源流的基本看法。

需要注意的是,张载后学,如蓝田吕氏等,在张载去世后多归二程门下,如果拘泥门户之见,似乎张载关学发展有所中断,但学术思想的传承往往较学者的理解和判断复杂得多。关学,如同其他学术形态一样,也是一个源远流长、不断推陈出新的形态。关学没有中断过,它不断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融合。明清时期,关学的学术基本是朱子学、阳明学的传入及与张载关学的融会过程。因此,由宋至清的关学,实际是中国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个动态的且具有包容性和创新性的概念,它开启了清初王船山学术的先河。

《关学文库》所遴选的作品与人物,结合学术史已有研究成果,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关学编》及《关学续编》《关学宗传》等,均是关中理学的典型代表,上起北宋张载,下至晚清的刘光蕡、民国时期的牛兆濂,能够反映关中理学的发展源流及其学术内容的丰富性、深刻性。与历史上的《关中丛书》相比,这套文库更加丰富醇纯,是对前贤整理文献思想与实践的进一步继承与发展,其学术意义不言而喻。

二、张载关学与程朱理学的关系

佛教传入中土后,有所谓“三教合一”说,主张儒、道、释融合渗透,或称三教“会通”。唐朝初期可以看到三教并举的文化现象。当历史演进到北宋时期,由于书院建立,学术思想有了更多自由交流的场所,从而促进了学人的独立思考,使他们对儒家经学笺注主义提出了怀疑,呼唤新思想的出现,于是理学应时而生。理学主体是儒学,兼采佛、道思想,研究如何将它们融合为一个整体,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从理学产生时起,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理学学派。

比如,在“三教融合”过程中,如何理解“气”与“理”(理的问题是回避不开的,华严宗的“事理说”早在唐代就有很大影响)的关系?理学如何捍卫儒学早期关于人性善恶的基本观点,又不致只在“善”与“恶”的对立中打圈子?如何理解宇宙?宇宙与社会及个人有何关系?君子、士大夫怎么做才能维护自身的价值和尊严,又能坚持修齐治平的准则?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中宇宙观与人生观的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认识,不可能一开始就有一个统一的看法,需要在思想文化演进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加以解决。宋代理学的产生及不同学派的存在,就是上述思想文化发展历史的写照,因而理学在实质上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传承创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张载关学、二程洛学、南宋时朱熹闽学各有自己的特色。作为理学的创建者之一,张载胸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术抱负,在对儒学学说进行传承发展中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北宋时期,学者们重视对《易》的研究。《易》富于哲理性,他通过对《易》的解说,阐述对宇宙和人生的见解,积极发挥《四书》义理,并融合佛、道,将儒家的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张载与洛学的代表人物程颢、程颐等人曾有过密切的学术交往,彼此或多或少在学术思想上相互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张载来到京师汴京,讲授《易》学,曾与程颢一起终日切磋学术,探讨学问(参见《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张载是二程之父程珦的表弟,为二程表叔,二程对张载的人品和学术非常敬重。通过与二程的切磋与交流,张载对自成一家之言的学术思想充满自信:“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

因为张载与程颢、程颐之间为亲属关系,在学术上有密切的交往,关学后传不拘门户,如吕氏三兄弟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苏昞、范育、薛昌朝以及种师道、游师雄、潘拯、李复、田腴、邵彦明、张舜民等,在张载去世后一些人投到二程门下,继续研究学术,也因此关学的学术地位在学术史上常常有意无意地受到贬低甚至质疑(包括程门弟子的贬低和质疑)。事实上,在理学发展史上,张载以其关学卓然成家,具有鲜明的特点和理论建树,这是不能否定的。反过来,张载的一些观点和思想也影响了二程的思想体系,对后来的程朱学说及闽学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启迪意义,这也是客观的事实。

张载依据《易》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但是,在基本点上和《易》的原有内

容并不完全相同。他提出“太虚即气”的观点,认为没有超越“气”之上的“太极”或“理”世界,换言之,“气”不是被人创造出的产物。又由此推论出天下万物由“气”聚而成;物毁气散,复归于虚空(或“太虚”)。在气聚、气散即物成物毁的运行过程中,才显示出事物的条理性。张载说:“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正蒙》卷一)他用这个观点去看万物的成毁。这些观点极大地影响了清初大思想家王船山。

张载在《西铭》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地是万物和人的父母,人是天地间藐小的一物。天、地、人三者共处于宇宙之中。由于三者都是气聚之物,天地之性就是人之性,所以人类是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朋友,归根到底,万物与人类的本性是一致的。进而认为,人们“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鰥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这里所表述的是一种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境界。

二程思想与张载有别,他们通过对张载气本论的取舍和改造,又吸收佛教的有关思想,建构了“万理归于一理”的理论体系。在人性论方面,二程在张载人性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孟子的性善论。二程赞同张载将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但二程认为“天地之性”是天理在人性中的体现,未受任何损害和扭曲,因而是至善无瑕的;“气质之性”是气化而生的,也叫“才”,它由气禀决定,禀清气则为善,禀浊气则为恶,正因为气质之性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气”的侵蚀而出现“气之偏”,因而具有恶的因素。在二程看来,善与恶的对立,实际上是“天理”与“人欲”的对立。

朱熹将张载气本论进行改造,把有关“气”的学说纳入他的天理论体系中。朱熹接受“气”生万物的思想,但与张载的气本论不同,朱熹不再将“理”看成是“气”的属性,而是“气”的本原。天理与万事万物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朱熹关于“理一分殊”的理论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太极只是个极好至善的道理。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又说:“太极非是别为一物,即阴阳而在阴阳,即五行而在五行,即万物而在万物,只是一个理而已。”(《朱子语类》卷九四)“理一分殊”理论包括一理摄万理与万理归一理两个方面,这与张载思想有别。

总之,宋明理学反映出儒、道、释三者融合所达到的理论高度。这一思想的融合完成于两宋时期。张载开创的关学为此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正如清初思想家王船山所说:“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张子正蒙注·序论》)船山之学继承发扬了张载学说,又有新的创造。

三、关学的特色

关学既有深邃的理论,又重视实用。这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学风笃实,注重践履。黄宗羲指出:“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明儒学案·师说》)躬行礼教,学风朴质是关学的显著特征。受张载的影响,其弟子蓝田“三吕”也“务为实践之学,取古礼,绎其义,陈其数,而力行之”(《宋元学案·吕范诸儒学案》),特别是吕大临。明代吕柟其行亦“一准之以礼”(《关学编》)。即使清代的关学学者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等人,依然守礼不辍。

其次,崇尚气节,敦善厚行。关学学者大都注意砥砺操行,敦厚士风,具有不阿权贵、不苟于世的特点。张载曾两次被荐入京,但当发现政治理想难以实现时,毅然辞官,回归乡里,教授弟子。明代杨爵、吕柟、冯从吾等均敢于仗义执言,即使触犯龙颜,被判入狱,依旧不改初衷,体现了大义凛然的独立人格和卓异的精神风貌。清代关学大儒李颀,在皇权面前铮铮铁骨,操志高洁。这些关学学者“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体现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节。

最后,求真求实,开放会通。关学学者大多不主一家,具有比较宽广的学术胸怀。张载善于吸收新的自然科学成果,不断充实丰富自己的儒学理论。他注意对物理、气象、生物等自然现象做客观的观察和合理的解释,具有科学精神。后世关学学者韩邦奇、王徵等都重视自然科学。三原学派的代表人物王恕以治易入仕,晚年精研儒家经典,强调用心求学,求其“放心”,用心考证,求疏通之解,形成了有独立主见的治国理政观念。关学学者坚持传统,但并不拘泥传统,能够因时而化,不断地融合会通学术思想,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由张载到“三吕”、吕柟、冯从吾、李颀等,这种融会贯通的学术精神得到不断承传和弘扬。

四、《关学文库》的整体构成

关学文献遗存丰厚,但是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和整理,除少量著作如《正蒙》《泾野先生五经说》《少墟集》《元儒考略》等在清收入《四库全书》之外,大量的著作仍散存于陕西、北京、上海等地的图书馆或民间,其中有的在大陆已成孤本(如韩邦奇的《禹贡详略》、李因笃的《受祺堂文集》家藏抄本),有的已残缺不全(如《南大吉集》收入的《瑞泉集》残本,现重庆图书馆存有原书,国家图书馆仅存胶片;收入的南大吉诗文,搜自西北大学图书馆藏《周雅续》)。即使晚近的刘光蕡、牛兆濂等人的著述,其流传亦稀世罕见。民国时期曾有宋联奎主持编纂《关中丛书》(邵力子题书名),但该丛书所收书籍涉及关中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内容驳杂,基本上不能算是关学学术视野的文献整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华书局将《张载集》《蓝田吕氏遗著辑校》《关学编(附续编)》《泾野子内篇》《二曲集》等收入《理学丛书》陆续出版,这些仅是关学文献的很少一部分。全方位系统梳理关学学术文献仍系空白。

关学典籍的收集与整理,是关学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文献整理的严重滞后,直接影响到关学研究的深入和关学精神的弘扬,影响到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和中国文化精神的发掘。

现在将要出版的《关学文库》由两部分内容组成,共40种,47册,约2300余万字。

一是文献整理类,即对关学史上重要文献进行搜集、抢救和整理(标点、校勘),其中涉及关学重要学人29人,编订文献26部。这些文献分别是:《张子全书》《蓝田吕氏集》《李复集》《元代关学三家集》《王恕集》《薛敬之张舜典集》《马理集》《吕柟集·泾野经学文集》《吕柟集·泾野子内篇》《吕柟集·泾野先生文集》《韩邦奇集》《南大吉集》《杨爵集》《冯从吾集》《王徵集》《王建常集》《王弘撰集》《李颀集》《李柏集》《李因笃集》《王心敬集》《李元春集》《贺瑞麟集》《刘光蕡集》《牛兆濂集》以及《关学史文献辑校》。

二是学术研究类,其中一些以“评传”或年谱的形式,对关学重要学人进行个案研究,主要涉及眉县张载、蓝田吕大临、高陵吕柟、长安冯从吾、朝邑韩邦奇、周至李颀、眉县李柏、富平李因笃、户县王心敬、咸阳刘光蕡等学人,共11部。它们分别是:《张载思想研究》《张载年谱》《吕大临评传》《吕柟评传》

《韩邦奇评传》《冯从吾评传》《李颀评传》《李柏评传》《李因笃评传》《王心敬评传》《刘光蕡评传》等。此外,针对关学的主要理论问题与思想学术演变历程进行研究,共3部。这些著作分别是:《关学精神论》《关学思想史》《关学学术编年》等。

在这两部分内容中,文献整理是文库的重点内容和主体部分。

《关学文库》系“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得到了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大力支持。文库的组织、编辑、审定和出版工作在组织工作委员会、编辑出版委员会领导下进行,日常工作由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文史研究馆)和西北大学出版社负责。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对这一功在当代、惠及后世的国家和省级重大文化精品图书高度重视,亲自担任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自始至终关心支持文库的编撰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江泽林,副省长王莉霞和省政府秘书长陈国强等对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给予悉心指导;原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局长薛保勤,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名誉主席赵馥洁,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陕西省文史研究馆)主任张祖培对文库的策划与实施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库历时五年编撰完成,凝结着全体参与者的智慧和心血。总主编刘学智、方光华教授,项目总负责徐晔、马来同志统筹全书,精心组织,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郑州大学等十余所院校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协力攻关,精益求精,体现出深沉厚重的历史使命感和复兴民族文化的责任感;他们孜孜矻矻,持之以恒,任劳任怨,乐于奉献,以古人为己之学相互勉励,在整理研究古代文献的同时,不断锤炼学识,砥砺德行,努力追求朴实的学风和严谨的学术品格。出版社组织专业编辑、外审专家通力合作,希望尽最大可能提高该文库的学术品质。作为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主任,我谨向大家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时间紧迫、经验不足等原因,文库书稿中的疏漏差错难以完全避免。希望读者朋友们在阅读使用时加以批评指正,以便日后进一步修订,努力使该文库更加完善。

张岂之

2015年1月8日

于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前言

李因笃(1631—1692),字天生,一字子德,又字孔德,陕西富平人,清初著名学者和诗人,关学大家,与李颙、李柏并称“关中三李”。他在经学、实学、史学、诗学等多个学术领域皆有相当造诣,其经学和音韵学成就堪与清初大家顾炎武相比肩。同时,他也是清初陕西最著名的诗人,闻名海内的文坛名家,享有“西京文章领袖”之美誉,堪称清初关中文坛盟主。此外,他还擅长书法,《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赞其“行、楷书用笔秃率,意近颜真卿”。

李因笃的学术道路与其家庭、地域以及时代的变迁紧密相关。崇祯四年(1631),他出生于富绅之家,书香门第,祖上曾为淮扬盐商,李因笃的父亲李映林笃信程朱理学,是明末大儒冯从吾的私淑弟子,不幸英年早逝。七岁时,李因笃受母亲教诲继承亡父遗志,遂与关学结缘。入清后,他坚守民族气节,无意科举,曾奔走塞上组织义士抗清未果,归来潜心为文论学,研习经典,著书立说,终成关中名儒。他与李颙、李柏、王弘撰等关中学人密切往来,同振关学,又借外出坐馆入幕、游走南北之机,广交顾炎武、傅山、屈大均、阎若璩、朱彝尊、王士禛等天下文人学者,相与切磋。康熙十八年(1679),他被荐举为“博学鸿儒”,北上京师应试,系康熙皇帝称誉的“四大布衣”之一。高中一等第七名后,李因笃任职翰林院检讨,纂修《明史》,月余即上疏辞职归乡,名动天下。晚年长居关中,积极弘扬关学,曾在关中书院、岐山朝阳书院讲学,乃是清初关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李因笃的著述有《诗说》《春秋说》《杜律评语》《仪小经》《受祺堂文集》《受祺堂诗集》三十五卷、《汉诗音注》十卷、《古今韵考》十卷,可惜《诗说》《春秋说》《杜律评语》业已亡佚。屈大均、陆陇其的著述中记载李因笃曾经纂辑《九经大全》《或问》《蒙引》《存疑》《浅说》等,但未见刊刻。作为清初著名学者,李因笃的学问得到了清初学者的高度评价。据《清史·儒林传》记载:“(李因笃)深于经学,著《诗说》,顾炎武称之曰:‘毛郑有嗣音矣!’又著《春秋说》,汪琬亦折服焉。”清代乾隆时期学者江藩《宋学渊源记》、沈德潜

《清诗别裁集》、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钱林《文献征存录》、刘绍攸《九畹文集·关中文传》等诸多文献对李因笃皆有著录。后世对于李因笃的成就也有较高肯定。如《清史稿》称其“学问富赡,十三经贯穿”。梁启超曾说“康熙之际,三李主之于内,亭林、恕谷辅之于外,关学之广大,几埒江南、河朔”,还将李因笃列为顾炎武的重要学侣,述及二人学术交谊。钱钟书先生曾赞李因笃曰“清初精熟杜诗,莫过李天生”,清诗专家钱仲联先生也称誉李因笃为“爱国诗人”。

关于李因笃的学术研究,民国十七年(1928)出版的吴怀清《关中三李年谱》第六、七、八卷为《天生先生年谱》,对李因笃的家世生平做了概述,将其诗文按年分系,对相关人物事件进行考证,谱后附有相关的传记资料、笔记书信、赠答诗文以及散佚的作品。该年谱资料翔实,内容丰富,为研究李因笃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1936年,宋联奎编辑《关中丛书》,重新刊刻了李因笃的《汉诗音注》《古今韵考》。学者赵俪生从四十年代起先后发表《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清初北方遗民奔走事迹考略》《顾炎武在关中》,主要探讨清初北方学者特别是遗民人士的社会交游活动,李因笃是其重点考察的对象。钱钟书在《谈艺录》中三次论及李因笃,对李因笃的“宗尚明七子”的主张及其杜诗学思想加以评价。八十年代以来,关于李因笃的专题研究逐渐增多。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撰有《天生学案》,首次对李因笃的学术思想做了较全面的阐述,对著述种类进行列举汇总,同时附有李因笃文章数篇。祁恒文《顾亭林与李子德之交》对顾炎武、李因笃的交游活动予以梳理。至二十一世纪初,出现了一批较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乃至专著。赵馥洁《试论李因笃经世致用的价值追求》重点阐述了李因笃的人才观、政治观、学术观等。方光华《关学及其著述》第四章第三节《李因笃思想的实学特色》在系统梳理李因笃学术思想的基础上,重点阐发了他的实学、音韵学思想以及汉诗学成就。李世英《清初诗学思想研究》一书第五章第三节专论李因笃的诗学思想。蒋寅《清初李因笃诗学新论》一文肯定李因笃“是清初关中最著名的诗人,也是对诗学有专门研究的诗论家”,在汉诗研究、诗歌音韵学研究方面独树一帜。孙微《清代杜诗学》则对李因笃的杜甫诗学做了较深入的研究,将李因笃视为与清初诗坛盟主王士禛齐名的杜诗学名家。高春艳的博士学位论文《李因笃文学研究》运用考论结合、诗史互证等研究方法,从家世生平、文学交游、学术思想、诗学主张、诗文创作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标举李因笃的关中文坛领袖地

位,揭示了李因笃的文学成就及其在清初文学史上的影响。章蜜的硕士学位论文《李因笃〈汉诗音注〉和〈古今韵考〉研究》对李因笃的音韵学成就及其不足做了扎实细致的考辨阐释,肯定李因笃为清代前期古音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整个清代古音学发展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刘重喜《李因笃的杜诗评语》、徐朋彪《李因笃音韵学研究的得与失》等论文,也就相关议题做了进一步探讨。除以上专题论文外,亦有许多学者在其论文著作中援引了李因笃的著述和事例。尤需注意的是,除大陆之外,台湾以及海外学者也有相关研究。如1995年台湾师范大学王立霞的硕士学位论文《李因笃之生平及其音韵学》、台湾简恩定《清初杜诗学研究》、美籍学者谢正光《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白谦慎《傅山的交往与应酬》《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等论文专著中,对于李因笃的音韵学、杜诗学,以及李因笃的交游活动皆有涉及。另据蒋寅一文所述,日本学者长谷部刚曾经撰写过《关于李因笃杜诗评语中的音注》一文,对李因笃的杜诗音韵学研究加以评论。

上述研究成果表明,李因笃研究正在日趋全面深入,他的文化学术成就及其影响逐渐为学界所认知。但从总体而言,李因笃的著述文献尚需系统整理,尚未出现对李因笃进行全方位深入研究的学术专著。

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来临之际,期盼已久的“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项目《关学文库》顺利启动,为集中系统地研究李因笃提供了良好机遇。笔者立足已有的研究基础,借鉴近十年来李因笃研究的新成果以及关学研究的新进展,整合贯通,对李因笃进行更加全面的学术观照,试图以此展现李因笃的大儒风范和综合成就。该书主要内容和理论观点由高春艳提出并写作完成,部分章节由袁志伟修改和补充完全。具体执笔分工如下:前言、第一章、第五章、第六章、结语由高春艳完成;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初稿由高春艳执笔,袁志伟做了大纲修改调整,并修改增补第二章第二、三、四节,第三章第三、四节,第四章第一、二、三节等章节的部分内容,共计增加一万七千字。

如前所述,李因笃一生所学甚广,在经学、实学、史学、音韵学、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等多个领域皆有造诣,大体可以分为学术思想和文学两个板块。

一、学术思想

1. 经学:堪与顾炎武比肩的清初经学家

入清之后,学术界开始反思亡国之因,批评明儒高谈心性、束书不观的空

疏学风,兴起了重考据、尚实证的朴学学术思潮。学者们将目光转向古代,因循汉儒解经之法,返古汲经,运用考据学、音韵学、训诂学等治学方法研究古代儒家经典,掀起了经学研究新高潮。李因笃即以其经学成就而为学界称道。王士禛称李因笃“博学强记,十三经注疏尤及贯穿”。据屈大均《翁山文外·宗周游记》记载,康熙五年(1666)他来陕游历,得与李因笃订交,“时天生方编《九经大全》未就”。汪琬又称:“世未尝无可师之人,其经学修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顾宁人、李子天生,皆与仆为友,仆老矣,虽不能师之,固所为欣然执鞭者也。”(《尧峰文钞·答从弟论师道书》)视李因笃和顾炎武为位居时代前列的经学大师,自己甘愿执鞭师之。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潜邱杂记》中,也曾记录了他和李因笃商榷的条目。遗憾的是,李因笃的《九经大全》未见刊行,《诗说》《春秋说》业已散佚,今人无从尽知其精深造诣,但从他的书信文章,以及相关文献中仍可寻检出他的一些经学成果。总结李因笃的经学思想,主要有两个基本观点。一是经学为理学之本。二是以朱熹经学思想为宗。他在写给学者孙承泽的书信中,明确表达他的经学基本观点:“窃观当世儒者,亦有留心斯道,高谈孔朱如某某人,然皆摭拾语录,妄称性命之旨,而绝不知从事经学。自因笃论之,断未有不深于经学而能以理学名世者。汉唐诸儒岂无天资卓迈、出处较然者?而终不得列理学一席,非经学不纯之故乎哉?因笃不揣鄙陋,窃谓经学当折中朱子,而朱子则以《四书集注》为主。”(《续刻受祺堂文集》卷三《与孙少宰书》)首先,表明的是“断未有不深于经学而能以理学名世者”“经学不纯,终不得列理学一席”,主张理学应以经学为本,只有精通经学,才成为理学大师,对于妄谈性命者予以贬斥。这一主张与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的观点如出一辙,表明了他们从事经学研究的原因,体现了清初学界批判晚明理学空疏不学、倡导研习古代经典、返本开新的学术新风气,具有划时代的思想史意义;其次,表明他的经学以朱熹的经学思想为宗,且以《四书集注》为准。

基于上述经学思想主张,李因笃殊少专门谈论性命义理的理学文章。他更多地是将义理阐发与传注考证相结合,实现了经学与理学的贯通。他在大力振兴和弘扬关学的过程中,更多地是从经学的角度积极阐发关中理学,坚守儒学经典精神传统。他在《创建朝阳书院序》一文中梳理关中理学源流,积极肯定关学鼻祖张载复兴孔孟儒学传统、开创关学学派的历史功绩,揭示了张载对二程、朱熹思想的影响,批评陆王心学、佛学对理学的无形侵蚀,赞誉

吕枬、王恕、冯从吾等人对朱熹经学传注思想也即理学正宗的恪守。宋振麟《朝阳书院奉迎李太史子德先生会讲录序》记叙了李因笃在岐山讲学的主要内容,称其“首发横渠以礼教人之旨,细论有守有为之义,而断之于审几,以着思诚之礼”“论学必馆之以经,说经必贯之以诸史”。说明李因笃主要运用援引经典的方法来论述张载倡导礼教等思想,其中“有守有为”“审几”“思诚”等话语分别出自《尚书》《易经》《孟子》等经学典籍,主张为人有操守、真诚,也是理学中经常探讨的心性修养等义理,体现了李因笃理学以经学为本的思想特征。

李因笃的经学思想另一显著特征是以经学为实学之本。这一特征突出体现其《郊祀》《漕运》《治河》《荒政》《乐律》等策论文章中。这些策论的基本结构大体相同。首先,引经据典对该策论的议题进行源流考辩,发掘《周礼》《尚书》《易经》等经学典籍中的相关记载和论述;其次,梳理历史变迁,总结规律和经验;最后,针对现存问题以古鉴今提出改进策略,这些策略乃是李因笃实学思想的精华所在。从中可以看出,李因笃的经学研究并非单纯的学术考证,而是旨在为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经典依据,实现经世致用的价值追求。也正是基于这一动因,李因笃的经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

2. 史学:纵论史书得失与著史方法,贯通古今广泛涉猎不同专题的史学家

李因笃精研经史,对于历代史书烂熟于胸。在《史学》一策中,他从体例的角度总结出古代史书经历了“三变四体”,并对历代史书的得失进行评析,提出了撰写史书必须具备“简才”和“疋事”两个基础条件。其一,是指选择具有撰史才能的人,其二,是指广泛搜集翔实可信的史料。在撰写史书的过程中,他提出辨体、尚质、阙疑、治例、原赞、专任等六大要点,包括体裁、风格、材料、体例、评论等方面的写作原则,以及专人把关保持一致等具体要求。他本人也曾在任翰林院检讨期间短暂参与了《明史》纂修的工作,也撰写了渭南南氏家族、孙传庭、张勇等明清历史人物的传记。最具特色的史学成果,则是他充分利用自己史学方面的丰富积累,将“以史为据,以古鉴今”作为一种基本的治学方法,应用在他的史学和实学研究当中。在其十三篇策论当中,他对相关议题历史源流的梳理和历史经验教训的分析,从古代到清初,提纲挈领简明扼要,在其后的对策部分,他以历史为参照,提出解决方案,有时也会根据现实问题的需要,直接采纳一些历史上取得良好效果的成功举措。例